

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

——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

夏维中 范金民

我们既已统计了明清两代江南进士的数量及其在全国所占的比例，考察了江南进士的地域分布情形及其特点，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探讨形成这江南进士甲天下的原因，换言之，江南人是凭藉什么条件、通过什么手段在科举考试中大显身手、屡屡夺魁而独领风骚的？

—

江南人攻读应举，有着相对于他地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经济和文化，从长时期来说，大体上是趋向一致的。如《研究之一》^①所示，明清两代江南进士占全国 15.24%，每 7 个进士就有 1 个多出自江南。而这种江南进士在全国独多的比例恰是与江南赋税在全国独重的地位相一致的。通计有明一代，江南田土仅占全国 6% 强，而税粮却占全国近 22%。清代江南重赋在全国的比例稍为下降，田地占 7% 强，银两占全国 17% 弱，但米麦本色占全国 77% 弱。大体而言，明清两代江南税粮占全国的 1/5。科考最盛、状元最多的苏州，也是江南重赋区中最重的府。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土地仅占全国 1.1%，而税粮却占近 10%。这种独重的状况，历明迄清一直未变^②。赋税苛重固然反映了封建朝廷对江南人民的榨剥程度，但也反映出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和供办实力。江南在明清时期，不但是帝制时代最为繁盛的时期，也是同时期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江南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精耕细作冠于全国，产量也远在他地之上，一亩之收，可抵北方 20 亩之产^③。更主要的是，江南工商业发达，是全国极为突出的商品生产基地和商品流通中心。苏州、松江的棉布，南京、苏州、杭州的丝绸，嘉兴、湖州的生丝，“衣被天下”，海内依赖。镇江的银，无锡的粮食，南京的木材，苏州的钱币，杭州的食盐，南京、苏州、常州、常熟的书籍，上海的豆粮，周布流转，聚宏用广。正是这发达的工商业，使江南经济历久不衰。明人王士性就曾说过，“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④清人唐甄也说，江南“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⑤。同样也正是这发达的江南经济，为江南进士的脱颖而出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科举考试，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王世贞说：“余举进士不能攻苦食俭，初岁费将三百金，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今遂过六七百金，无不取贷于人。盖贽见大小座主，会同年及乡里，官长酬酢，公私宴飨，赏劳座主仆从与内阁吏部之舆人，比旧往往数倍，而裘马之饰，又不知节省。”^⑥王氏所言当仅指会试前后的费用，家境富裕者用银 300 两，寒门子弟或攻苦食俭者需银百两。王氏举进士在嘉靖二十九年，三四十年后科试费用已涨了一倍以上。明代后期如此，清代物价持续上涨，各项费用大增，科考支出大概非千金不办。大名鼎鼎的画家文征明十次乡试不中，其曾孙东林魁杰文震孟 11 次会试才登第。清代缪彤在发誓不复再考的五次会

试后才荣登榜首。海内闻名的陈家，陈其元共乡试15次，前后居矮屋中135天。更有甚者，成名后“海外诸国争走重金购诗集”的沈德潜，“历岁科试凡三十余次，乡试十有七次”不中（直到68岁方成进士），仍不急不躁^⑦。王世贞年19，一举中的，费银数百两。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乃至十数次、近20次的应考，费用之巨实难计算。自然这还不包括长年聘请塾师寒窗苦读的费用。如此高昂的费用，对难以饱腹的贫民小户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显然只有那些富室大户才能承受。江南进士之所以特别集中在各府的附郭县和少数世代为宦的簪纓望族中，就是因为只有那些地区或那些家族能够以充裕的财力供其子弟潜心科考，毫不气馁地向读书做官的高峰不断攀登。明清两代苏州一地的60余位三鼎甲，绝大部分出身于书香门第或世代仕宦之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进士主要出自家境优裕的富康之家，特别是那些士宦巨族。

科举考试原则上是面向社会各个阶层的。非身份人户由于耕种田亩或经营工商业得法，积累了财富，有实力聘请塾师，使其子弟走科举攻读之路，从而崛起于村夫野老之间，跻入缙绅行列。明清时代的江南进士，有不少就是起自素封之家、甚至是贫寒之家的。

明中期开始，江南农户力田致富者逐渐增多，苏州人吴宽说：“三吴之野，终岁勤动，为上农者不知其几千万人。”^⑧这些上农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者很少见，而投资培植子弟入仕者较为普遍。如无锡华氏，原来“屋庐弊陋，田园毁顿”，明中期有华庄者，“唯以力田勤家为务，善自节缩衣食为俭约，家以日饶”，其子昶得以从名师游，考中进士^⑨。又如吴县进士陈霁，其父“独课僮仆力耕稼。久之，收入滋多，开辟浸广，腴田沃壤，弥跨湖塘，又积书延师教子，”^⑩为后代创下了科考的资财。再如洞庭西山徐氏，“有原隰陂池田园之利”，世擅其富，但从无出仕者，有徐震者，将儿子取名为缙、绅，日夜督学，缙终于登顺天乡试，^⑪向入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如长洲吴行，世代隐于农，家境艰难，他“内负干力，奋自树植，徙居苏城，朝夕拮据，积二十余年始复故业，且寝加裕焉……教子专用儒业，及一鹏举进士，入翰林”^⑫，终于跨入仕宦行列。如华亭陆树声，“家世业农”，本人也“少力田，暇即读书”，与弟树德都通籍为进士，子彦章也为进士。^⑬如嘉定许氏，勤于治生，多蓄积，延礼耆儒以教诸子，“故许氏富而多在衣冠之列”。^⑭同县朱珽，未生子时见《进士录》，发誓有子当为此辈人，后子朱用宾终为进士^⑮。如嘉靖时吴江周用，进士出身，秉铨吏部，以清慎著名，考其先世，皆业农^⑯。如文章节概声播遐迩的秀水进士冯梦禎，其家“以沤麻至巨万，祖、父皆不知书”^⑰。突出者如明中期昆山李玉，世代为农，家有良田，见儿子聪明绝伦，高兴地说：“吾数十年谋所以为吾业者，而不得。吾家良田，其在此也。吾耕之种之，而食其实矣。”千方百计让子宪卿潜心于学，终登甲科^⑱。

这些都是明代江南农家子弟挺身于陇亩的典型事例，同类材料在文集和地方文献中较为散见。可见在科考场上，贵胄介裔与素封子弟没有什么界限。富裕农民以耕种良田的心态来培植子弟，宜乎不少人由田亩走向仕途。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主要用来形容那些出身寒素的进士的。很明显，江南进士的队伍因为庶民子弟的加入而更为庞大。

江南商品经济发达，工商业者、特别是商人长袖善舞，获利致富者所在多有。这些人将经营所得投资于子弟教育，后代有不少厕身于士林。明清两代苏州地区的36个状元，至少有3个为商人之子，即明代苏州第一个状元施槃，虽不屑就家人产业，而奋然有志于学，却曾随经商的父亲游淮扬；嘉靖时位至大学士的顾鼎臣，其父是个开店的小商人；曾任清朝驻外四

国公使的洪钧，其父为商，还要洪钧弃儒就商。最为荣显的状元如此，一般进士出身商贾之家者自然更多。位至南京吏部尚书的杭州人张瀚，为嘉靖十四年进士，自述其先世“亦以机杼起”。东林领袖无锡顾宪成、允成兄弟，分别为万历八年和十四年的进士，其父顾学，“生于粗僻之乡，长于贾，老于布衣”，两个哥哥帮助父亲经商，使他们得以专心于举业^⑧。正嘉时，号称“安百万”的无锡安国，业农起家，经商成巨商，其子如山、孙希范、曾孙绍芳三世登第。明末政绩科技皆足称道的徐光启，其世代“力耕于野”，其祖弃农为贾，家才稍裕，到其父时，“拓产十倍”，足供其读书^⑨。按照张瀚的说法，“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⑩。这些致富工商人户的子弟当有不少也迈上了科考仕宦之路。康熙时，无锡号称“南朱北杨”的两家富商，后人多读书，都有儿子成进士。洞庭商人是明中后期起活跃于商界的一支重要商帮，有“钻天洞庭”之称，在其家乡洞庭东西山，明清两代出过2名状元，1名探花，2名会元，50名进士。这些荣登甲榜者，大多非为商人子弟，即为商人之后嗣。

江南不但当地商人的后代有不少走上了科举之路，而且外地商人落籍江南者，其子弟举进士者也复不少。江南商品经济发达，是称雄天下的徽商的重要活动场所，不少徽商子弟寄籍江南，高中进士。崇祯十三年崇德县进士曹广，其祖即是徽州歙县岩镇的商人，逐什一于浙江，其父正式卜居崇德^⑪。清代歙县寄籍苏州中进士者，占该县寄籍外地中进士者的15%^⑫。杭州附郭仁和、钱塘两县在清代之所以进士独多，也与该地是徽州盐商、木商的重要据点而多寄籍者有关。苏州状元汪铎、潘世恩、洪钧，考其先世，都是徽商。外地商人落籍江南者大多为富商巨贾，有着雄厚的财力培养子弟应举。

美籍华裔学者刘广京有感于明清江南商业的兴盛，推测“苏杭是商业最发达的区域，功名繁盛必亦与商人财富有关系”^⑬。上述事例说明，江南功名之盛与商人财富之雄不但必有关系，而且确有关系。工商、特别是商人子弟的博取功名，使得江南进士队伍更为壮观。

由《研究之一》可知，自明后期到清前期，江南进士的数量是趋向不断增加的，在全国的比例是不断上升的，而这个时期正是江南农工商业稳定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庶民子弟登第入仕的比例当较之任何时期为高。嘉道之际的乌程人沈尧说：“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贷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⑭。沈尧张皇其辞，过于偏激，但却道出了经济基础与科第进取的关系。江南进士之多，正是奠基在江南经济之富庶之上的。

二

经济是科考的基础，但功名兴盛并非全系经济因素。江南进士之所以绵绵不绝，蔚为大观，为举世瞩目，与江南地区全社会好学勤学、重教重考、擅长科考大有关系。

江南人读书喜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良好的习惯。早在北宋中期，苏州人朱长文即说，“自本朝承平，民被德泽，垂髫之儿皆知翰墨，戴白之老不识戈马。”^⑮宋许克昌则说，松江“虽佃家中人衣食才足，喜教子弟以读书，秀民才士，往往起家为达官，由是兢劝于学，弦歌之声相闻”^⑯由南宋经元而至明，江南文风更甚。明归有光说：“吴为人材渊藪，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龄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己者，江以南其俗尽然。”^⑰清初人说：“今虽闾阎贱隶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⑱这些概括，正

是江南人热衷举业的写照。如松江，明代当地人说：“自书籍归职方，士习不变……经学词章，下至书翰，咸有师法，各称名家。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⑳入清后，仍是“家弦歌而人诗礼”。^㉑如杭州，“里巷诗书，户不绝声”。^㉒“诗书礼乐，闾阖而是”^㉓，“家诗书而户礼乐也”^㉔，键户下帷，惟知读书稽古”^㉕。如苏州，“家家礼乐，人人诗书”^㉖。如太仓，“街坊子弟习举业者彬彬郁郁”^㉗。如昆山，明代“家知读书，人知尚礼”^㉘，清代更是“邑人最重读书，十室之聚，必有乡塾以教童蒙。为士者必兼习五经及四子书，有废学者，乡党弗齿，士弗与友也”^㉙如常熟，“士之习诗书者，诵读之声比户相闻”^㉚，“子弟皆幼而读书，每有司较童子试，辄及先人”^㉛。如常州，“士子多以读书世其家”^㉜，郡士人崇师喜读者，弦诵之声比屋而是“^㉝。15世纪末年，途经江南的朝鲜人崔溥是这样概述的：“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间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㉞。所有这些描述，其义皆一，说明江南人好读喜学，蔚然成风，习俗使然，社会整体文化素质较高。

这种“家弦户诵”的风气，“人人诗书”的盛况，由来既久，泽被自广。在文风兴盛为天下最的江南诞生出一批批科场得意者也就顺理成章。所以清末陈夔龙将此归结为江南进士辈出的一个原因。说“其间山水之钟毓，与夫历代师儒之传述，家弦户诵，风气开先，拔帜匪难，夺标自易”^㉟。

更为突出的是，明清时代的江南人，勤苦力学，目标十分明确，这就是以科举为首业，以登第入仕为最终目的。这又与其它地区家不蓄书、有书不读，即使读书也“直以九章当六籍”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北方的山西，“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连雍正皇帝都习知比风^㊱。江南近邻徽州，明代人说该地“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㊲，虽未必如此“左儒右贾”，但充其量不过“贾儒相通”。读书应举的执著精神和普遍程度，江南人堪称全国第一。嘉靖时，有人讽刺说，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诵读时文上^㊳。杭州士子企盼功名，往往到天竺的于廉庙去祈求^㊴。可见读书应举到了痴迷的地步。这样的读书，带有赤裸裸的功利色彩和追名逐利的动机，已与求学问道宗旨相去甚远，却与当时朝廷的提倡、社会的认同十分契合。

明清以科举取士，读书人一旦博得功名，便畀以高官厚禄，诱使无数儒生入彀。明初重儒轻法，“于是大用诸儒，参错布列于中外，凡武健善用法者弗与也”^㊵。从而出现了“乡校间士人以举子业为事，或为古文词，众辄非笑之”的奇怪现象^㊶。但其时进士、举贡、吏员不分高低，三途并用。永乐宣德以后，渐循资格，弘治、正德以后，更只讲出身，举贡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轻低昂，不啻霄壤”^㊷。人们更以录取进士为荣，“士益向风，争取磨濯，攘袂以起”^㊸。故明末钱谦益感慨道：“今天下独重进士科，以进士起家者，譬如洛阳之花，一出于畦塍则已享朱门幄帘之奉，其由它途者，则不能也。”^㊹。进士则由于风光体面，授秩崇高，升迁快速，宗亲沾光，因而互相标榜，互相夸耀，苏人尤甚。弘治年间，长洲陈玉汝、常熟李世贤、吴江吴禹畴、吴县王济之和吴宽五人，因是同时、同朝、同乡、同志、同道，就结了个“五同会”，“公暇则辄具酒馔为会，坐以齿定，谈以音谐，以正道相责望，以疑义相辨析。兴之所至，即形于咏歌；事之所感，每发于议论”^㊺。得意神态，形诸颜色，溢于言表。

明清朝廷的这种取士标准和方法，甲榜进士具有的辉煌前程和傲视群彦的社会地位，时刻激励着有着好学传统、甘心苦读的一代又一代江南知识分子。

科考机制使得缙绅阶层倏起倏落，时刻变动，士宦之家要保持家业不坠，仕途不绝，富

贵长久，读书登第是最为有效最为可靠的途径。万历时王士性说，“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⑤。明后期江南人也清醒地认识到，“不读书登第，不足以保妻、子”^⑥。正是在这种动机驱使下，世代士宦之家仍然如履薄冰，聘请名师，课督子弟，研习时文。甚至不惜经商营利，使子弟无后顾之忧，捐置族田，资助族人攻举。如长洲编修吴一鹏之父，就曾刻意“不使其子治生业”^⑦。常熟瞿元初之祖不但买田筑室，培养孙子，还源源不断地接济与其孙商讨学问者。一代古文大家归有光的祖母、母亲为了使归家重振，督促有光功课的情景极为动人。明中期昆山李氏，值家中落，至脱簪珥为子延师，“夜必篝灯手绩以课业”，直到子、孙考中进士^⑧。长洲彭氏进士代不乏人，致人将其归因于设文昌神祈求，由彭绍升之话可知，实际皆因该族督课严厉非同一般。昆山徐氏三兄弟都膺鼎甲，其母督学之严是出了名的。后来官至刑部尚书的徐乾学，有慨于世人以土田货财或金玉珍玩或园池台榭传世而子孙不能守，乃筑传是楼，庋藏数万卷，拟传诸子，并殷殷解释其动机即为了让子孙懂得读书科举入仕于保富贵的重要。徐氏此举，正是江南官宦人家希望读书攻举以保长久富贵的典型。江南进士大多数产生于世家大族，既与这些家族资财丰厚有关，也与这些家族高中得起落第不起的心态有关，诚然也与他们世代相承拼搏科场积累了丰富经验有关。

对于寒门小户来说，科考也是摆脱贫困或扩大资财、跻身上层行列的唯一途径，于是母督子、妻励夫，发奋读书者在在有之。如顾一清者，家甚贫，其母“乃脱簪珥资给之，而躬督之学”^⑨。而钱文通者，为诸生时，“游乡学，勤苦特甚，夫人昼夜纺织以资给之，得专意于学问。遂取高科入翰林，以文名于世”^⑩。如广东按察司副使周济叔之父，当其子未显时，亲自督促，令子“从旁诵读，夜分乃寝，率以为常”^⑪。清代无锡地区，进士之多甚于明代，这类勤学劝学督学的例子，随处可见。庶民子弟或许因为攻读机会更为不易，家人的期望更加殷切，寒窗苦读的劲头也就更加充足。诚如时人所言，“贡、监、生元等，奋志芸窗，希心持籍，或贫而辍馆，远道盈千；或老而观场，背城战一。少年英俊，父兄之智责难严；壮岁飞腾，妻孥之属望尤切”^⑫。

明清江南文运弘开，进士辈出，正是社会各个阶层都视读书应考为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门所造成的。

三

江南进士冠绝海内，与江南环境之美、条件之优也不无关系。

江南北襟江，东傍海，中贯运河，享有明清时期东西南北往来最为繁忙的交通大动脉之利。境内更是水系成网，港湾遍布，舟楫往来自如，文人学士结社社会，切磋交流，信息传递迅捷，往返便利，百货纷陈，文化生活丰富。江南山岱秀丽，泉水清冽，湖光山色，处处画景，谚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袁宏道是这样描写苏州的：“山川之秀丽，人物之色泽，歌喉之宛转，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凑，高士之云集，虽京都亦难之。”^⑬在这舒适的人间天堂里，文人学士优游自在，或寄情山水，或潜心学问，“或辨理诂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⑭。进士崛起其间，乃属事理之常。明清时人探讨江南文才辈出时，动辄以灵秀所钟系之。如明人归有光说，“论者以为山穷水汇，灵秀之所钟，故人材之出，常甲天下”^⑮。又说昆山“山区水聚，天地之精气，蜿蜒回薄而会于此，故士之登朝者，踞阼仕者，常倍于他州”^⑯。如清人宋荤说，“其地襟江汇湖，其山川秀丽，融结盘礴之气，往往泄之为文，故求文章于吴，譬求珠于沧溟，求玉于元圃也”^⑰。由此

二例，可概其余。其说似过于简单。人文盛衰非由环境决定，但环境优美吸引了四方人士汇聚江南，百物纷陈为士子切磋交流提供了各种便利，钟灵毓秀启发了江南学人的聪明才智，从学名流又使江南士子见识日增累积，环境促成了江南士人之伙。

江南号称文献渊薮。明胡应麟说：“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而且“书多精整，率其地梓”^⑧。江南册籍充栋，都是当地刻、当地人藏的。江南藏书家之多，藏书之富，绝对全国第一。宋槧元刻，鲍抄毛校，翻检有途，书肆林立，购买方便。江南是读书人的天堂。明清时期，江南市场上最为畅销的，似乎不是艳词淫曲、志怪小说，而是应考举子必备的科举时文，免园册子。江南选家之多，选择之精，坊间翻刻之快，流布之广，成为时文大本营。顾炎武感慨地说：“至一科旁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⑨东林人士江阴李应升，赋闲在家，也随时关注苏州时文行情。清流操此勾当，他人可以想见。这既反映了江南读书人的价值取向，也为科考之士带来了福音。江南士子近水楼台，自易在科考时捷足先登。

江南教育发达，黉宫宏伟，书院林立，学校为科考储备人才，书院为士子制造舆论，都是科举成功的有效途径。王铨豪气十足地说：“吾苏学宫，制度宏壮，为天下第一。人才辈出，岁夺魁首……自范文正公建学，将五百年，其气愈盛，岂文正相地之术得其妙欤！”^⑩同时人也将苏州宏壮的学校与辈出的人才有机联系起来，王鏊说，苏学独名天下，故“自宋以来科第往往取先天下，名臣硕辅亦多发迹于斯”^⑪；徐有贞则说，“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⑫。学校是培养科举人才的，学校盛自然进士多。书院自嘉靖至万历三朝，就新建34所，为明初130年来的3倍^⑬。江宁的钟山书院，无锡的东林书院，江阴的南菁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诂经精舍等，最为名重一时。这些书院的山长，多是博学贯通、称雄当时的大师，又多是科考的行家里手。他们在传道授学的同时，在担任缙绅巨室的塾师之际，也将他们投身科场的经验教训、酸甜苦辣传给了江南士子，所谓“盖非得于师友之渊源，即得于家庭之传习”^⑭。江南士子知识既博，方法又多，宜乎科考屡操胜券。

江南进士既多，仕宦既显，且多据清华选人之列，江南人又多垂意于桑梓，奖掖拔擢乡邦后进，不遗余力，江南进士也就如滚雪球般，日益膨大。松江何良俊说：“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故其文献足征。”^⑮何氏之说确实揭示了苏州人的特点。文坛领袖归有光对此直认不讳，说：“古之君子，与天下之贤材，以事其君，未有不爱其同类。至其同乡之人，尤情不能已者。故为之先者，望其后之兴；为之后者，愿其先之达。”^⑯归氏还振振有词地说：“夫士以其身为国，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尝然也。既富方穀，必也有好于其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绝其私耶？”^⑰清初苏州人也说：“吴郡人文自有制科以来，名公巨儒先后颺起，皆崇尚正学，言坊行表，为后世倡率。士子读书谈道，喜为标榜重誉，而矜名节，时禀先正之遗规焉。”^⑱清代常州人则称，“武进、阳湖，师儒各有门径，学者讲求诵习，致其专精，殆无不表襮而显达。”^⑲可见整个江南人皆如此。松江状元唐文献、张以诚，著名画家董其昌、大学士徐光启、黄体仁，都“以名宿不利场屋”，经同乡先达或父母官的提携资助才高中甲榜^⑳。又如松江范长白，曾以时艺就教于秀水沈德符之父，乡试又出沈之门，称为“通家小友”，又与乌程董份尚书为好友，虽蹉跎公车十年间，终于甲榜^㉑。那种“他日必贵”、“必成名器”之誉，既是江南先贤对后进的推许，也是激励造声势之法。江南进士正是在相互砥砺中不断向上攀登的。江南多三鼎甲，多

- ①康熙《松江府志》周建鼎跋，卷五四《遗事下》。
- ②万历《杭州府志》卷一九《风俗》。
- ③③万历《钱塘县志》陈禹谟序；《纪事》。
- ④莫旦《苏州赋》，弘治《吴江志》附录。
- ⑤弘治《太仓州志》卷三《风俗》。
- ⑥嘉靖《昆山县志》卷一《风俗》。
- ⑦《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一《风俗》。
- ⑧崇祯《常熟县志》卷三《风俗》。
- ⑨康熙《常熟县志》卷一《风俗》。
- ⑩康熙《常州府志》卷九《风俗》。
- ⑪康熙《武进县志》卷一三《风俗》。
- ⑫崔溥《漂海录》第194页。
- ⑬⑬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 ⑭《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山西学政刘于义雍正二年五月九日折。
- ⑮《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
- ⑯⑯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五《史一》，卷一六《史十二》。
- ⑰光绪《杭州府志》风俗一引成化志。
- ⑱贝琼《贝清江集》卷一九《送国子学正赵伯庸赴永宁尹序》
- ⑲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编《传记》。
- ⑳顾清《东江家藏集》卷四二《周母太恭人李氏墓志铭》。
- ㉑诸联《明斋小说》卷七《录遗告示》。
- ㉒《袁宏道集》，转引自《苏州诗词》第97页。
- ㉓高启《高太史凫藻集》卷二《送唐处敬序》。
- ㉔汪琬《尧峰文钞》宋萃序。
- ㉕胡应麟《少室山房笔钞》卷四。
- ㉖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十八房》。
- ㉗王铤《寓圃杂记》卷五《苏学之盛》。
- ㉘徐有贞《苏郡儒学兴修记》。
- ㉙参见王友三主编《吴文化史丛·吴地书院》，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㉚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八《风俗一》。
- ㉛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
- ㉜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一九《选举》。
- ㉝钞本《万历野获编·乙未诸才士》。
- ㉞如乾隆四十三年会试，总裁为金坛于敏中，四个同考官中有两个是江南人，即嘉定秦大成和元和陈初哲，三人都是状元出身。
- 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三《陈亦韩先生》。
- ㊱《见闻杂录》卷一〇，五条。

(责任编辑 吕小鲜)